

· 巴以问题研究 ·

德国的巴以问题政策取向及其演进逻辑

李文红 刘泽昊

内容提要 巴以问题极为复杂，牵涉多重因素，是德国中东政策的重要关注点。德国对巴以问题的政策取向经历了3个历史发展阶段：冷战期间联邦德国持明显亲以色列立场；统一后的德国兼顾巴以双方利益；国际格局加速演进背景下德国重回集团政治立场。在2023年10月7日以来的新一轮巴以冲突中，德国先是无条件力挺以色列，后试图兼顾其亲以色列和支持巴勒斯坦合法权益的原则立场，其立场呈现在波动中找寻平衡的特点。影响德国巴以问题主张变化的因素较为复杂：历史上形成的与以色列的“特殊关系”、出于自身经济和安全利益的考量而重视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向世界彰显自身国家定位的成功转型并希望推动欧盟在巴以问题上实现“用一个声音说话”、通过加强对巴以问题的介入程度提升本国和欧盟的话语权。尽管德国意欲通过推动巴以问题成功解决进一步提升其在区域及全球性热点事务上的影响力，但德国与以色列较为紧密的“特殊关系”、失衡特征明显的德阿关系、美国等域外大国的强势介入，以及德国领导力在欧盟内部遭到削弱等因素，对德国在巴以问题上的主张及其实践构成制约。其结果是，德国针对巴以问题的资源投入与效果产出不成比例，且限制了德国政策主张发挥更大作用。

关键词 德国外交 欧盟 以色列 巴以问题 新一轮巴以冲突

作者简介 李文红，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泽昊，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学院博士研究生。

巴以问题是影响中东地缘政治的核心问题之一。二战结束后，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建立的以色列国与包括巴勒斯坦在内的阿拉伯国家先后爆发5次战争。各方虽就停止冲突作出过一些努力，但巴以和平始终未能达成，大小冲突仍然不断。2023年10月7日爆发的新一轮巴以冲突使多方势力卷入其中，冲突外溢效应愈发凸显。中东地区毗邻欧洲，中东局势动荡势必会引

起德国的关注。事实上，巴以问题是德国对中东地区外交的重要关注点之一。德国作为美西方阵营成员，多年来在巴以问题上投入了可观的精力与资源，并就该问题的解决形成了具有德国特色的主张。德国坚持两国方案，在确保以色列安全的前提下，推动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巴勒斯坦国。但是，较之美西方盟友，德国在巴以问题上的立场并未对地区局势产生重大影响，反而在实践中遭遇多维度挑战。那么，从历史角度看，德国对于巴以问题的立场与政策取向如何？在当下新一轮巴以冲突中政策取向是否发生变化？德国的巴以问题政策取向面临哪些困境？这些都是本文尝试回答的问题。

国内外学界对德国在巴以问题上立场的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国内有的学者从多元视角对德国的中东地区包括巴以问题的政策取向，以及德国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① 有的学者梳理了德国与以色列双边关系的发展史；^② 有的学者聚焦研究了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德国与以色列关系的发展态势。^③ 从国外研究状况看，基于德国权威机构（如德国外交部和德国联邦政府）的信息源，相关学者总结并研判了巴以冲突的历史及其未来走向，并分析了德国对此问题的立场。例如，德国国际政治与安全研究所（SWP）在其发布的报告中，建议德国避免“单向指责任何一方”，应该“认真对待两国人民的民族情感和安全需求，谴责暴力”^④，在巴以冲突外溢后，该机构还对以色列与伊朗关系未来走向和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对当地局势的影响进行了分析。^⑤ 总的来看，国内外学界对于本项研究议题已有深厚积淀，但仍存

① 殷桐生主编：《德国外交通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2 年版，第 283～288 页；余国庆著：《欧盟与中东关系——政治与安全视野下的考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年版，第 62～78 页。

② 郑春荣、罗玮：《德国的以色列政策：基于道德义务和现实政治》，载《德国研究》2016 年第 1 期，第 4～15 页；宋莉涛：《冷战后德国—以色列关系的新发展》，载《以色列研究》（第 2 辑）2021 年第 1 期，第 139～149 页；李超著：《领导与塑造——默克尔时代的德国外交研究》，时事出版社，2024 年版，第 120～124 页。

③ 张腾欢：《德国与以色列关系进一步“特殊化”》，载《世界知识》2024 年第 2 期，第 46～48 页；黄颖、王思懿：《复合身份政治视域下德国对以色列政策分析》，载《德国研究》2024 年第 5 期，第 66～87 页。

④ Muriel Asseburg, Peter Lintl: “Gefährliche Eskalation um Jerusalem: Deutschland und die EU müssen handeln”, SWP, 17 Mai 2021, <https://www.swp-berlin.org/publikation/gefaehrliche-eskalation-um-jerusalem-deutschland-und-die-eu-muessen-handeln>, 2024-10-17.

⑤ Katja Belousova und Kevin Schubert, “Internationale Kritik an Israel: Was bedeutet das UNRWA-Verbot für Gaza?”, zdfheute, 30 Oktober 2024, <https://www.zdf.de/nachrichten/politik/ausland/unrwa-verbot-kritik-israel-nahost-100.html>, 2024-10-30.

在以下不足：一是未能将德国—以色列关系和德国—巴勒斯坦（或阿拉伯国家）关系进行系统性比较，仅专注于研究一方的历时性政策演进；二是有的学者虽将德国立场纳入欧盟政策框架内进行讨论，但大多数相关研究未将美国这一对中东局势影响较大的德国盟友因素考虑在内，未对美、德两国在巴以问题上的立场及其影响进行横向比较。基于此，本文在上述方面尝试深化此议题研究，以进一步为中国在巴以问题上发挥大国作用提供有益镜鉴。

一 德国对巴以问题的政策取向变化

巴以冲突时间长，规模和破坏性大，受地理位置、历史纠葛及现实利益等多重因素影响，该问题对德国的外溢效应明显，是德国中东地区政策所要应对的重点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段，受到国际格局变化的影响（从两极格局到多极化趋势，再到阵营化表征出现），德国基于国家利益的界定（从专注于意识形态到走向全球，再到回归平衡路线），对巴以问题的立场态度进行了相应调整。

（一）冷战期间联邦德国持明显亲以色列立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两极格局形成，德国在随后开始的冷战中分裂为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联邦德国必须选择国际伙伴，避免维持中立或走特殊道路。联邦德国首任总理阿登纳实行融入西方政策（Westintegrationspolitik），其主要目标为融入西方民主政体圈子，^① 倒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集团，将其作为同盟伙伴。鉴于冷战的意识形态斗争色彩和以色列采用了类西方的代议制民主政体，在冷战期间，联邦德国虽然也将处理与阿拉伯国家关系（包括巴勒斯坦）纳入其外交重点，但亲以色列特征在其政策取向中更为浓厚，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积极推动德以和解进程，并采取多种形式援助以色列。受冷战时期特殊政治气候影响，两个德国对新成立的以色列国态度及政策大相径庭：民主德国不承认本国对世界范围内的犹太人负有历史赔偿责任，拒绝承认以色列国，并对本国境内犹太人的权利实施限制；而联邦德国愿意承认纳粹德国在二战中

^① Marie - Luise Recker, “Westintegration als Erfolgsfaktor - Konrad Adenauer und die Einbindung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in den Westen”, Konrad - Adenauer - Stiftung, 16 Mai 2024, <https://www.kas.de/de/web/geschichtsbewusst/essay/-/content/westintegration-als-erfolgsfaktor-konrad-adenauer-bundesrepublik-deutschland-westen>, 2025 - 01 - 05.

对犹太人犯下的大屠杀罪责，并给予以色列赔偿。对于以色列而言，该国从建国初期就陷入阿拉伯国家的敌意状态，一度面临生死存亡重压，急于获得援助并在外交领域打开孤立局面。基于联邦德国主动承认历史罪责的姿态和共同的利益需求，两国克服了来自以色列朝野特别是大屠杀幸存者对德国的仇恨情绪等难题，在 1952 年和 1957 年分别签订了象征双方和解的《卢森堡条约》和“军火输送秘密协议”，由此确立了联邦德国对以色列的经济和军事支持态度，之后双方于 1965 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开创了“历史责任驱动型”国家间关系。在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方面，联邦德国首任总理阿登纳“大方地承认了他（在此事上）怀有政治动机，同时也由于联邦德国对以色列有强烈的道德义务”。^① 联邦德国与以色列恢复关系，既有现实层面上努力融入西方阵营的考量，也有价值观层面上直面历史责任从而重塑国际形象的考虑，两方面因素强化了德以双边关系的韧性。虽在赫尔穆特·施密特政府时期，德以关系陷入低谷，但若从冷战整体时间范围来看，德以关系运行总体平稳。

第二，德阿关系发展遭到德以关系压制。冷战期间，大部分阿拉伯国家属于苏联阵营，巴以问题从属于阿以冲突，而且巴勒斯坦的重要政治组织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也受到苏联支持，因此无论从现实利益角度看，抑或价值观角度看，德以关系都处于联邦德国的中东政策中被优先培育的地位。虽然德以关系取得进展，且极大减轻了联邦德国重新融入西方的阻力，但联邦德国的价值观外交特性也成为其发展与巴勒斯坦及阿拉伯世界关系的严重阻碍。

早在德以沟通大屠杀赔偿事宜时，阿拉伯国家联盟就反对阿登纳的计划，认为联邦德国不应向一个与邻国处于战争状态，而且拒绝为成千上万沦为难民的阿拉伯人担责的国家提供援助。^② 但联邦政府无视阿方意见，认为不能使批准赔偿协定一事取决于同阿拉伯国家谈判的结果是否顺利。^③ 1956 年第二次中东战争后，为避免苏联势力渗入地中海地区，阿登纳开始在阿以问题上让步，主张“必须解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争端问题，并且普遍满意地处理苏伊士

① Lily G. Feldman,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West Germany and Israel*. Fifty Cross Street, Winchester, USA; Allen & Unwin Inc., 1984, p. 41.

② Ruairi Casey, “How Germany Lost the Middle East”, *Foreign Policy*, May 24, 2024,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4/05/24/germany-israel-gaza-palestine-war-middle-east-politics-soft-power-speech>, 2024-05-24.

③ [德国] 康拉德·阿登纳著：《阿登纳回忆录 1953-1955》，杨寿国、孙秀民、马仁惠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年版，第 124 页。

运河的问题”^①，但1964年末联邦德国同以色列之间的军火协议被媒体曝光后，路德维希·艾哈德政府无视埃及施压，坚持同以色列建交，这导致埃及、叙利亚等多个阿拉伯国家与其断交，民主德国趁机与埃及等国进一步深化关系。^②

维利·勃兰特上台后，在东西方缓和的背景下推行“新东方政策”，为缓和德阿关系起到了一定作用。迟至1974年，因德以建交而与联邦德国断绝关系的阿拉伯国家又全部与其复交，在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联邦德国也拒绝为以军提供补给的美机飞越其领空。^③ 尽管如此，第三次中东战争的爆发使得部分巴解组织成员与联邦德国左翼组织成员串联起来，航班遭劫、奥运会惨案等事件的发生激起了联邦德国民众和巴解组织间的对立情绪，打击了勃兰特政府的努力。虽然联邦德国在施密特政府时期签署了《威尼斯宣言》，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④ 但1987年巴勒斯坦人民大起义爆发时，联邦德国再度倒向遭到孤立的以色列。

总的来看，冷战期间，联邦德国历届政府普遍采取亲以政策，纳粹政权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事件和冷战的价值观斗争特点深刻影响了联邦德国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等阿拉伯国家关系，即使建立在石油贸易基础上的德阿关系也难以撼动德以关系的优先级。正是在历史和现实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联邦德国在各方面都与以色列形成了较为亲密的关系，远超该国与巴勒斯坦等阿拉伯国家的关系。

（二）统一后的德国兼顾巴以双方利益

冷战结束前夕，两德于1990年统一，此时两极格局濒临瓦解，德国开始将眼光投向全球性外交事务，这意味着统一后的德国不仅延续联邦德国的外交政策，也要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民主德国的外交遗产，如后者与亲苏联的阿拉伯国家相对较好的关系，这就要求德国对其巴以政策取向进行调整以适合新外交环境。与此同时，巴以和平曙光初现，1991年马德里和会召开，1993

① [德国] 康拉德·阿登纳著：《阿登纳回忆录1955-1959》，第197页。

② 楼天雄：《埃及与德国关系中的价值龃龉与务实合作》，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2年第3期，第138页。

③ Leandros Fischer, “Germany and the Palestine Question Since 1949: Breaking with the Nazi Past, Adapting to Changing Interests”, Interactive Encyclopedia of the Palestine Question, <https://www.palquest.org/en/highlight/36455/germany-and-palestine-question-1949>, 2025-01-04.

④ “Venice Declaration”, https://content.ecf.org.il/files/M00062_VeniceDeclaration1980English.pdf, 2025-01-04.

年巴以签署了第一份和平协议——《奥斯陆协议》，双方作为两个独立国家和平相处以及巴勒斯坦建国的愿景空前地接近现实。对于上述变化，德国势必做出政策调适。

一方面，减轻价值观色彩，凸显平衡立场，并积极参与到解决巴以问题的机制中。基于历史和现实等多重因素，两德统一初期，德国在巴以冲突问题上尽力维持低调姿态，着重强调保证以色列的安全。科尔政府坚持中东问题三原则，即保证以色列在得到承认的边界内的生存权，强调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强调中东问题有关各方放弃使用武力。^① 1998 年红绿联盟上台，在继续发展与以关系的同时，施罗德政府明确表示支持巴勒斯坦人通过民族自决建立属于自己的国家，认为“两国方案”才是实现巴以和解、进而从根本上维护以色列安全的应有之策。^② 自此，德国开始在欧盟框架内为解决巴以冲突出谋划策，施罗德与时任德国外长菲舍尔在推动冲突降级、提出中东和平七点计划、开展“穿梭外交”方面作出了极大努力。这不仅为德国在冲突解决方面赢得了声誉，增加了阿拉伯世界对德国的好感，也大大推动了德国与阿拉伯国家的经贸和人员往来。同时，施罗德谴责以色列对叙利亚的空袭“侵犯了一个国家的主权”，而且“是不能接受的”，这被外界解读为德国总理在对以色列的行为表达不满。在默克尔于 2005 年上台后，德国政府在提升德国和欧盟在巴以问题上作用的目标指引下，推动中东问题四方会谈机制重新启动，并多次阐明德国立场，即承认以色列的自卫权，同时推动一个独立、民主的巴勒斯坦国的建立。^③ 2021 年末上台的朔尔茨政府在其执政纲领中，既强调“保障以色列安全是德国基本国策（Staatsräson）”“谴责对以色列国的威胁和对其人民的恐怖行为”“在包括联合国的各平台中对抗反犹太主义”“要求巴勒斯坦放弃对以色列使用武力”，又声称“坚持 1967 年边界基础上的两国方案”“要求停止违反国际法的定居点建设行为”，^④ 在两方间维持平衡的意味明显。

另一方面，增强对以色列政策的独立性，缓慢淡化历史约束痕迹。2008

① 殷桐生主编：《德国外交通论》，第 285 页。

② 郑春荣、罗玮：《德国的以色列政策：基于道德义务和现实政治》，第 8 页。

③ 殷桐生主编：《德国外交通论》，第 286 ~ 287 页。

④ “Mehr Fortschritt wagen; Bündnis für Freiheit, Gerechtigkeit und Nachhaltigkeit – Koalitionsvertrag 2021 – 2025 zwischen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 (SPD), BÜNDNIS 90/DIE GRÜNEN und den Freien Demokraten (FDP)”, [https://cms.gruene.de/uploads/assets/Koalitionsvertrag - SPD - GRUENE - FDP - 2021 - 2025. pdf](https://cms.gruene.de/uploads/assets/Koalitionsvertrag_-_SPD_-_GRUENE_-_FDP_-_2021_-_2025.pdf), 2025 - 01 - 04.

年底，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Ehud Olmert）下令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发动了代号“铸铅行动”的军事行动，巴以局势急转直下。2009年，利库德集团领导人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上台，其右翼立场使得德以关系再次降温。2010年2月，德国对以色列扩大犹太人定居点的政策提出批评，同年5月德国就以色列对援助加沙的船队采取军事行动提出批评。2012年，德国在联大给予巴勒斯坦观察员国地位的表决中投了弃权票。这一系列行为透露了德国对以色列的不满之意，并在承认巴勒斯坦地位问题上出现立场松动的迹象。^①在实行“有为外交”之后，德国虽依然亲以，但在部分问题上更敢于坚持自己的认知，如2014年7月，德国政府罕见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向加沙地带发射火箭弹造成平民伤亡；2021年5月巴以局势激化，德国强调双方都要为停火而努力。^②

此外，德国也试图与美国的高度亲以政策拉开距离。2018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单方面决定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德国与部分欧盟国家指责美国此举加剧地区动荡。^③此后，包括加布里尔、马斯、贝尔伯克在内的数任德国外长均对以色列持续在约旦河西岸修建犹太人定居点表示关切，并呼吁以色列立即停止激化局势、破坏和平的单边行为。^④

经过冷战结束以来的调适，德国在巴以问题上的政策立场基本成型。这体现在德国外交部网站有关巴以问题原则的表述之中：“基于历史原因，德国对以色列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即维持以色列的犹太民主国家身份，并坚定保障以色列的安全；同时，德国支持巴勒斯坦自决权与建立国家的努力，德国与其伙伴坚信，只有通过谈判才能达成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的巴勒斯坦国并促成其与以色列永久和平相处的目标，只有一个经过谈判且被双方接受的两国方案才能带来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持久和平。”^⑤

① 郑春荣、罗玮：《德国的以色列政策：基于道德义务和现实政治》，第9页。

② 李超著：《领导与塑造——默克尔时代的德国外交研究》，第123页。

③ 殷桐生主编：《德国外交通论》，第287页。

④ Shimon Stein, *Germany – Israel Relations: Unique or Normal?* INSS Insight, No. 1030, 2018, p. 3; “Gemeinsame Erklärung der Sprecherinnen und Sprecher der Außenministerien Belgiens, Dänemarks, Deutschlands, Finnlands, Frankreichs, Griechenlands, Irlands, Italiens, Luxemburgs, Maltas, der Niederlande, Norwegens, Polen, Schwedens und Spaniens zu israelischen Siedlungen”, Auswärtiges Amt, 13 Mai 2022, <https://www.auswaertiges-amt.de/de/newsroom/-/2531226>, 2024-01-13.

⑤ “Der Nahostkonflikt – Die deutsche und europäische Position”, Auswärtiges Amt, 19 Oktober 2021, <https://www.auswaertiges-amt.de/de/aussenpolitik/nahermittlerosten/-/203626>, 2021-10-19.

显然，德国希望将支持以色列的基本国策与支持巴以和谈以及巴勒斯坦建国三者统筹起来。

（三）国际格局加速演进背景下德国重回集团政治立场

进入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受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等事件影响，国际格局加速演进，大国博弈再次回潮，类冷战型对抗逐渐加深。作为美西方阵营的重要成员，囿于日渐明显的国际社会阵营化趋势，德国巴以政策自主性开始减弱。本轮巴以冲突爆发的深层次原因之一便是美国无视巴勒斯坦合法权益，强行推动以色列与周边阿拉伯国家和解，感到边缘化危机的 Hamas 意在重新唤起世界对巴勒斯坦问题的重视。在这一过程中，德国未对美国的政策进行有效阻止，反而采取默许态度。而且，受政府内绿党影响，德国将捍卫民主价值观作为巴以问题的优先事项，在其历史上首部《国家安全战略》中，德国声称“为以色列存在权承担责任是其长久义务”，但对巴勒斯坦则只字未提。^① 本轮冲突既是 Hamas 对美西方厚此薄彼的外交政策意涵的反击，又是对德国在巴以问题上立场的一次大考。就迄今为止的冲突发展历程来看，德国立场出现前后波动性变化。

在冲突初期德国无条件力挺以色列。2023 年 10 月 7 日，Hamas 对以色列发动突袭，以色列军民出现一定程度伤亡，超 200 人被 Hamas 等巴方武装人员带回加沙地带扣押。冲突爆发次日，德国总理朔尔茨便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强调“捍卫以色列的安全是德国的基本国策（Staatsräson），在这样的困难时期尤其如此”。10 月 12 日，朔尔茨在议会发表讲话，再次声明“目前德国唯一的立场是站在以色列一边……德国历史和大屠杀带来的责任使德国永远有义务支持以色列的存在和安全，联邦政府正在按照这一格言行事……以色列有权对这些野蛮袭击实行自卫”。^② 德国联邦议院也表达了对以色列的跨党派声援态度，谴责“针对以色列的非人道恐怖主义行为”。

① “Der Nahostkonflikt – Die deutsche und europäische Position”, Auswärtiges Amt, 19 Oktober, 2021, <https://www.auswaertiges-amt.de/de/aussenpolitik/naehermittlererosten/-/203626>, 2024 - 01 - 19. “Wehrhaft. Resilient. Nachhaltig. Integrierte Sicherheit für Deutschland – Nationale Sicherheitsstrategie”, Die Bundesregierung, Juni 2023, <https://www.nationalesicherheitsstrategie.de/Sicherheitsstrategie-DE.pdf>, 2025 - 01 - 04.

② “Deutschland steht an der Seite Israels – und setzt sich für eine Deeskalation ein”, Die Bundesregierung, 25 Juni 2024, <https://www.bundesregierung.de/breg-de/aktuelles/unterstuetzung-israel-2228198>, 2024 - 06 - 25.

除高层表态外，德国还在政治、外交和军事等层面采取了一系列支持以色列的措施，包括大力声援以色列、加快对以色列军事装备的出口审批、严厉打击境内亲哈马斯的组织、全面审查对巴勒斯坦援助、加大对德国境内反犹言论及行为的打击力度等。更为罕见的是，德国联邦议会通过议案，要求申请加入德国国籍者需明确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若申请人在入籍后有任何针对以色列的攻击行为，有可能被剥夺国籍，^① 这一前所未有的行为显示了支持以色列深深嵌入了德国的内政乃至社会生活之中。2024 年 1 月，在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以下简称“近东救济工程处”）被爆出有员工参与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行动后，德国一度停止了对该机构的拨款。这些行为都显示了德国对以色列关切的高度敏感与重视。

德国国内对阿拉伯和穆斯林群体的反感明显上升。“九·一一”事件后，阿拉伯世界在西方的形象渐趋负面，加之阿拉伯剧变后大量穆斯林移民涌入德国，德国社会对穆斯林群体的态度并不友好。本轮冲突爆发后，在德国的穆斯林明显感到被排挤和歧视，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无端遭到辱骂和人身攻击，穆斯林社区收到恐吓信，部分伊斯兰教建筑遭到打砸破坏。极右翼势力趁机兴风作浪，几乎每周都有德国选择党（AfD）成员或极右分子在图林根州清真寺前抗议。^② 鉴于德国国内犹太人与穆斯林两大族群对抗风险升高，在 2024 年慕尼黑安全指数中，德国民众对涉伊斯兰因素恐怖袭击风险的担忧指数高居 32 个选项中的第二位。^③

而巴以冲突进入持续延宕阶段后，德国试图重回平衡路线。随着加沙战事演进，以色列逐渐占据绝对优势，哈马斯已基本上不可能对以色列构成实质性的安全威胁，以军在加沙的作战行动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和生活设施损坏，引发国际社会关切。尤其是加沙地带人道主义状况恶化，国际社会对以色列在加沙人道主义问题上的表现持批评态度，以色列的国际形象逐渐转向负面，德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声誉和形象也因其偏袒以色列而受损。

① 张腾欢：《德国与以色列关系进一步“特殊化”》，第 46 页。

② Christoph Strack, “Muslime in Deutschland – , Wie nach dem 11. September 2001”, *Deutsche Welle*, 14 Januar 2024, <https://www.dw.com/de/wie-nach-dem-11-september-2001-muslime-in-deutschland/a-67948582?mobileApp=true>, 2024-01-14.

③ Munich Security Index 2024, Münchner Sicherheitskonferenz, München; Februar 2024, https://securityconference.org/assets/01_Bilder_Inhalte/03_Medien/02_Publikationen/2024/MSR_2024/MunichSecurityIndex2024.pdf, 2024-02-27.

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使德国政府陷入两难境地：既要坚持保障以色列安全是德国国家利益一部分的承诺，又不能违背国际法，漠视以色列军事行动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① 面对日益恶化的加沙平民处境和德阿关系，德国开始将重心放在劝和促谈上，主张双方立即停火，保障平民生存和安全。冲突爆发一个月左右，朔尔茨批评了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扩张犹太人定居点的政策，并呼吁巴以双方通过“两国方案”解决冲突。^② 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则强调，以军在使用自卫权及推进加沙地面行动时“必须遵循国际法，不能忽视对平民的保护”。^③ 2024 年 3 月 17 日，朔尔茨访问约旦，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就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达成共识并表示：“以军对拉法的地面行动不仅会让大批平民沦为受害者，还会大大加剧国际社会和平解决危机的难度。”^④ 朔尔茨还在同年 4~6 月间 3 次与内塔尼亚胡通电话，重点商讨释放人质、避免局势升级、改善加沙平民生活条件等问题。^⑤

综上，朔尔茨政府在本轮冲突中辗转腾挪，试图兼顾其亲以色列和支持巴勒斯坦合法权益的原则立场，呈现在波动中找寻平衡的特点。在这一过程中，德国根据具体情境和形势发展调整政策取向，显示出由价值观向现实主义的过渡倾向。在冲突前期，德国在历史和价值观等多重因素驱动下力挺以色列，将以色列面对哈马斯袭击的自卫权置于优先地位；在意识到片面力挺以色列立场有可能成为外交政策负面资产后，德国对其政策进行微调，即在不反对以色列自卫权和生存权的前提下，从对以色列无条件支持中抽身，对以色列的过激行为加以批评，并重新强调两国方案的重要性。

① 郑春荣主编：《德国发展报告（2024）——战略转型中的德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 年版，第 16 页。

② 焦授松：《巴以冲突加深德国社会裂痕》，载《光明日报》2023 年 11 月 25 日。

③ “Politische Gespräche inmitten eines Konflikts, der nur Dilemmata kennt – Außenministerin Baerbock reist erneut nach Israel”, Auswärtiges Amt, 14 Februar 2024, <https://www.auswaertiges-amt.de/de/aussenpolitik/nahermittlererosten/-/2643734>, 2024-02-14.

④ “Deutschland und Jordanien drängen auf Waffenruhe in Gaza”, *Deutsche Welle*, 17 März 2024, <https://www.dw.com/de/deutschland-und-jordanien-dr%C3%A4ngen-auf-waffenruhe-in-gaza/a-68596434?mobileApp=true>, 2024-03-17.

⑤ “Bundeskanzler Scholz telefoniert mit dem Ministerpräsidenten von Israel, Netanjahu”, Die Bundesregierung, 2 Juni 2024, <https://www.bundesregierung.de/breg-de/aktuelles/bundeskanzler-scholz-telefoniert-mit-dem-ministerpraesidenten-von-israel-netanjahu-2290034>, 2024-06-02.

二 影响德国巴以问题主张变化的因素

德国在巴以问题上的核心主张可归纳为三点，一是确保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和自卫权；二是建立一个独立、完整且民主的巴勒斯坦国，并促成其与以色列的永久和平；三是支持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巴以和平谈判。除了外部国际环境和中东地区形势的变化以外，德国对自身外交政策转型的考量也对其在巴以问题上的主张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德以特殊关系决定了德国对以色列的责任义务

德国与以色列的特殊关系，决定了德国将维护以色列安全作为巴以政策的基本前提。二战中，纳粹德国毫无人性地屠杀了约 600 万犹太人，战后的德国想重塑自身国际形象，摆脱施暴者身份，就必须从各方面与纳粹划清界限，在对待犹太人及犹太国家的态度上显示善意。对大屠杀浓重的愧疚感和自认为应世代背负的道义责任是德国能够与以色列形成今日特殊关系的心理基础。联邦德国首任总理阿登纳回忆道：“1949 年我任联邦总理时，就把调整我们跟犹太人的关系看成是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我们的诚意首先可以用物质援助来证明。不过同时我们必须避免使人产生这样的印象，以为过去的过错似乎可以用，而且也只需物质来抵消”^①，这至少说明阿登纳认为仅用物质援助和补偿是不能换取犹太民族对德国所犯历史罪行的谅解的。与阿登纳相似，后来的德国领导人对纳粹迫害、屠杀犹太人的暴行一直怀有深重负罪感，并以实际行动屡屡表达深刻道歉与忏悔。2005 年 2 月，时任德国总统克勒访问以色列，并在以色列议会发表演讲，以“悲伤、痛心和耻辱”的心情反思纳粹的反犹罪行；^② 2008 年 3 月 18 日，默克尔在耶路撒冷发表演讲，在演讲中她称：“在我之前的历届联邦政府和历任德国总理都认为德国有义务承担历史责任，即维护以色列安全；这种德国的历史责任也是德国基本国策的一部分。这

① [德国] 康拉德·阿登纳著：《阿登纳回忆录 1953-1955》，第 104 页。

② “Address by Federal President Horst Köhler to the Knesset in Jerusalem”, Der Bundespräsident, 2 Februar 2005, https://www.bundespraesident.de/SharedDocs/Reden/EN/HorstKoehler/Reden/2005/02/20050202_Rede.html, 2024-11-02.

意味着对我——德国总理来说，以色列的安全没有商量余地。”^① 正是在默克尔任期内，德以关系变得更加密切且多样化，双方通过定期会晤、举行内阁联合会议等措施不断深化关系。2021 年 10 月，默克尔在卸任前最后一次访问以色列，她前往亚德瓦希姆大屠杀纪念馆敬献花圈，并再次强调德国人所应承担的责任。^② 有媒体评论称：“默克尔并不是第一位因大屠杀而对以色列负有责任感的德国总理，但除第一任总理阿登纳外，其他总理对以色列的责任感无一人甚于默克尔。”^③ 通过这些行动，德国证明了对自身所犯罪行真诚悔过的历史态度。在通过直面历史的态度赢得以色列的原谅和信任后，对大屠杀的道德负罪感逐渐转化成为公众心理中重要的历史记忆，渗入二战后德国居民的日常生活和政治家们的决策中，并从个人、国家和国际 3 个层面作用于德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践。^④ 随着大屠杀记忆的延续和强化，德以特殊关系也就不断得到持续和强化。

德以特殊关系在思想和心态层面具有强烈的道德特征，在实践层面则体现为双方紧密的合作关系。德国在反犹和大屠杀中伤害了犹太人的安全感，在二战之后则将保护以色列的安全作为德以关系道德特征中的具体体现。保护以色列安全在实践中主要体现为对反犹主义的打击和对以色列的军售。就前者而言，2022 年 11 月，德国政府出台《反对反犹太主义、支持犹太人生活的国家战略》，以法律形式明确表示德国对纳粹大屠杀的回忆负有责任，具体包括保护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以及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即反对任何对以色列存在权的攻击；^⑤ 2024 年 11 月 7 日，尽管面对一定争议，德国联邦议会仍以多数通过了一份对抗反犹主义的决议，该决议旨在“在面对高涨的反犹和仇以

① “Rede von Bundeskanzlerin Dr. Angela Merkel: vor der Knesset am 18. März 2008 in Jerusalem”, Die Bundesregierung, 18 März 2008, <https://www.bundesregierung.de/breg-de/service/newsletter-und-abos/bulletin/rede-von-bundeskanzlerin-dr-angela-merkel-796170>, 2024-11-18.

② 殷桐生主编：《德国外交通论》，第 284 页。

③ Herb Keinon, “The Message in Merkel’s Swan-song Trip to Israel – analysis”, *The Jerusalem Post*, October 4, 2021, <https://www.jpost.com/international/the-message-in-merkels-swan-song-trip-to-israel-analysis-681029>, 2024-11-04.

④ 郑春荣、李勤：《俄乌冲突下德国的“时代转折”——基于历史记忆影响的分析》，载《德国研究》2022 年第 6 期，第 8 页。

⑤ “Nationale Strategie gegen Antisemitismus und für jüdisches Leben”, Die Bundesregierung, Berlin, November 2022, https://www.bmi.bund.de/SharedDocs/downloads/DE/publikationen/themen/heimat-integration/nasas.pdf?__blob=publicationFile&v=7, 2025-01-02.

情绪时，加强对在德犹太人的保护”。^①就后者而言，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统计，2003～2023年，德国仅次于美国，稳居对以色列军售的第二名；在2013～2015年期间，德国还短暂反超美国，成为以色列最大军售来源。2003～2023年，德国政府批准的对以色列军售许可证达到4427项，未批准的仅有54项，通过率高达99.75%。自2013年以来，以色列在9个年度中位居德国对外军售的前10名。^②在2019～2023年间，德国向以色列出口的军火占据德国军火总出口的12%，以色列成为同期德国军火出口的第三大目的地。^③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德国对以色列军售额度短期内出现明显上扬。在同年10月7日至11月2日的26天内，就有185项对以武器出口许可被批准，而2023年全年批准的许可证数量是308项。上述大力度支持使得2023年德国对以色列军售价值达到3.27亿欧元，成为近20年中价值第四高的对以色列年度军售。^④德国对以军售规模之大、批准速度之快，都体现了德以之间特殊且紧密的安全纽带。

（二）德国对自身利益的考量促使其重视对阿拉伯国家关系

对以关系并不是德国在其巴以政策中唯一需要重视的关系。德国为维护其经济和安全利益，需要与阿拉伯世界合作，也就需要对牵动阿拉伯人情感和地区稳定的巴勒斯坦问题有所作为。阿拉伯国家在国际移民、国际能源领域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德国存在着与阿拉伯世界合作的特定需求，并且这种需求近年来呈上升趋势。对德国来说，能否恰当处理对阿拉伯国家关系十分重要。

一方面，对阿拉伯国家关系事关德国经济利益，尤其是能源安全。长期以来，中东是欧盟主要石油来源地之一，欧盟1/3以上的石油和天然气来自中东。作为欧盟制造业大国，德国经济对能源高度依赖，充足的能源供应以及低廉的能源价格是德国制造业高速发展的基础和保障，德国对中东石油的需求不言而喻。^⑤近年来，国际地缘政治变动和能源转型令德国对阿拉伯能源

① “Nie wieder ist jetzt – Jüdisches Leben in Deutschland schützen, bewahren und stärken”, Deutscher Bundestag, 7 November 2024, <https://dserver.bundestag.de/btd/20/136/2013627.pdf>, 2024-11-07.

② Forensis, *German Arms Exports to Israel (2003–2023)*, 2 April 2024, pp. 4–5.

③ Pieter D. Wezeman, Katarina Djokic, Mathew George, Zain Hussain And Siemon T. Wezeman,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Arms Transfers*, 2023, March 2024, https://www.sipri.org/sites/default/files/2024-03/fs_2403_at_2023.pdf, 2024-11-15.

④ Forensis, *German Arms Exports to Israel (2003–2023)*, 2 April 2024, p. 5.

⑤ 钮松：《德国中东政策与欧盟中东政策的相互影响》，载《德国研究》2010年第1期，第14页。

的需求进一步增加。在绿色转型潮流影响下，德国在 2019 年宣布逐步停用煤电能源的计划，在 2038 年要关闭所有燃煤电厂。这意味着德国的能源更加依赖进口，阿拉伯油气出口国对德国的重要性自然也会上升，2022 年 2 月乌克兰危机升级后这一情势更加凸显。美欧各国为声援乌克兰对俄罗斯发起经济制裁，之前与俄罗斯在能源方面有着密切合作关系的欧盟决定与俄罗斯能源脱钩，并在全球各地寻找可靠替代来源。2022 年下半年，德国总理朔尔茨先后访问卡塔尔、沙特和阿联酋三国，并与阿联酋发表联合声明，阿联酋从 2023 年开始将每月向德国能源公司提供多达 25 万吨的柴油燃料。媒体评价“对这三个海湾国家的访问并不是朔尔茨的政治梦想之旅，但乌克兰危机久拖不决的现实迫使他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防止德国的能源供应在冬季崩溃”。朔尔茨不得不化身为总理级的“能源业务员”，为了德国的能源安全开展“沙漠中的务实外交”。^① 另一方面，对阿拉伯国家关系也事关德国社会安全和政治稳定。中东长期动荡，欧洲相对富裕和稳定，大量中东国家难民向欧洲流动，成为欧洲尤其是德国面临的棘手问题。2011 年之后，利比亚、叙利亚、也门内战爆发，大量阿拉伯国家难民从西亚和北非地区经由巴尔干地区和地中海涌入欧盟国家。难民潮在 2015 年达到高峰，大批难民滞留德国，不仅给德国和欧盟带来了诸如恐怖袭击、治安恶化、社会动荡等一系列问题，而且改变了德国和欧盟的政治生态，导致了极右势力滋长，进而侵蚀了德国社会原有的自由、民主、开放等价值观。^② 鉴于难民入境后德国政治和社会环境发生巨变的教训，当加沙地带有出现大规模难民潮趋势时，德国必须尽全力防止本国重蹈覆辙。深化与阿拉伯国家关系、促成巴以双方早日停火，有利于从根源上避免难民潮的出现。

因此，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德国需要一个繁荣、稳定且对德国友好的阿拉伯世界，这在一定程度上要求德国妥善处理巴勒斯坦问题。在冷战结束后的一段时期中，阿拉伯国家虽逐步与巴以冲突拉开距离，不再让巴勒斯坦问题绑架阿以关系，但不可否认的是，巴勒斯坦问题仍是阿拉伯世界的中心问题之一，仍是阿拉伯世界最广泛的道义关切，仍然牵动着阿拉伯国家的对外政策和社情民意。2023 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战火蔓延多地，沙特等阿

① 王怀成：《德国总理中东“寻气”不容易》，载《光明日报》2022 年 10 月 3 日。

② 郑春荣著：《德国默克尔政府外交政策研究（2013—2019）：从克制迈向积极有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年版，第 84 页。

拉伯国家暂停了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就说明了巴勒斯坦问题对阿拉伯世界的重要性。因此，德国必须在支持巴勒斯坦合法权益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以此来保障和巩固德阿关系的发展。

（三）德国国家定位转型影响其危机处理方式

德国欲在应对巴以冲突上发挥作用，彰显国家定位的成功转型。冷战结束两德统一后，德国再次成为大国，希望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大国作用。德国并未如约翰·米尔斯海默等学者所想象的采取进攻性现实主义路线，^①而是致力于在多边框架内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和法制化，主张通过谈判与协商解决冲突，逐渐成为“文明力量”国家。^②但近十年来，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地缘政治与大国竞争回潮，世界不稳定不确定性增多，全球权力格局变化显现，仅仅扮演“文明力量”角色已跟不上形势发展。因此，德国近年来致力于从单纯的“文明力量”逐渐向聚拢更多资源、使用更多手段的“建构力量”转变，将维护价值规范与奉行权力政治融为一体，以更好地适应与处理德国及欧盟在全球竞争中所面临的挑战。^③

在巴以这一全球性热点问题上，德国恰恰可以尝试发挥“建构力量”和“文明力量”的双重作用。一方面，展示德国特色的“建构力量”，在多边框架下参与涉及巴以冲突的军事行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邦德国基本法第87条a款规定联邦国防军的活动仅限于防卫以及救援事务，1994年联邦宪法法院对基本法中的“防卫”重新作出司法解释，赋予其防止国际人道主义危机扩散等新含义，为联邦国防军在海外进行军事行动扫清了制度障碍。^④在2006年黎以冲突中，德国协助以色列对真主党封锁武器运输，并在战后依据联合国第1701号决议派海军参加联黎部队，实现向中东地区派兵的历史性突破；^⑤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德国于2024年初派遣黑森号（Hessen）护卫舰，参加欧盟框架下抵御胡塞武装袭击的海上护航任务——阿斯匹德行动（EU -

① John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5, No. 1, 1990, pp. 5 - 56.

② Hanns W. Maull, *Deutschland als Zivilmacht*, in Siegmund Schmidt, Gunther Hellmann and Reinhard Wolf, eds., *Handbuch zur deutschen Außenpolitik*,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2007, pp. 73 - 84.

③ 黄萌萌：《德国外交角色的变迁：从“文明力量”到“建构力量”？》，载《欧洲研究》2023年第2期，第81页。

④ 殷桐生主编：《德国外交通论》，第150页。

⑤ 同上书，第287~289页。

Operation ASPIDES)。这种参与本身表明德国不再刻意回避使用军事手段，体现了德国运用硬实力塑造地区态势、遏止巴以冲突升级的主动性。

另一方面，继续保持“文明力量”底色，首选非军事手段干预和解决冲突，力争消除任何激化局势的可能性。德国外交部对非军事手段在危机预防中的政策优先级有明确规定：“（在危机预防与解决方面）民事手段一直享有优先权，其目的是事先预防危机；识别危机并在其激化前缓和冲突是负责任外交政策的重点；在大多数情况下，外交调停和安全领域改革都可以通过此种途径达到目的”，联邦政府特别强调，“对联邦政府来说军事投入只能当作最后手段”。^① 与此对应，德国的巴以政策将包含民主价值观色彩的民事手段作为主要工具。即使采取军事行动，德国的军事行动与美、英等盟国相比都是克制自律的。^② 在巴勒斯坦内部政治进程上，德国积极支持巴勒斯坦 2006 年立法会选举，并承认哈马斯胜选。^③ 同年，德国还在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斡旋，两次促成双方的战俘交换。在人道援助问题上，德国是近东救济工程处除美国以外的第二大捐助国，流向近东救济工程处的每 10 欧元捐助款项中至少有 1 欧元来自德国。2018 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曾下令停止向近东救济工程处拨款，而来自德国等欧盟国家与海湾国家的捐款保证了近东救济工程处的运行。德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托马斯·扎恩埃森博士（Dr. Thomas Zahneisen）曾称，“德国将是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可靠伙伴，德国呼吁所有捐助者及本地区的机构与个人支持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工作”。^④ 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德国外长贝尔伯克于 2024 年 2 月 29 日宣布向加沙追加 2 000 万欧元人道主义援助，并敦促以色列政府保证物资安全且不受阻挠地进入加沙。^⑤ 为切实改善加沙平民恶劣的生存环境，德国空军与法军合作，于 2024 年 3 月中旬首

① “Umsetzung der Leitlinien der Bundesregierung: Krisen verhindern, Konflikte bewältigen, Frieden fördern”, Auswärtiges Amt, 31 März 2021, <https://www.auswaertiges-amt.de/de/aussenpolitik/krisenpraevention/leitlinien-krisen/217444>, 2024-03-31.

② 彭泉著：《走过“默克尔时代”——德国对外关系的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 年版，第 230 页。

③ 钮松：《德国中东政策与欧盟中东政策的相互影响》，第 17 页。

④ “Unterstützung für Palästina – Flüchtlinge: Deutschland bleibt verlässlicher Partner von UNRWA”, Auswärtiges Amt, 23 Juni 2022, <https://www.auswaertiges-amt.de/de/aussenpolitik/humanitaere-hilfe/unrwa-konferenz/2538568>, 2024-06-23.

⑤ “Außenministerin Baerbock zur humanitären Lage in Gaza und Erhöhung der Humanitären Hilfe um 20 Mio. Euro”, Auswärtiges Amt, 29 Februar 2024, <https://www.auswaertiges-amt.de/de/newsroom/-/2646936>, 2024-02-29.

次向加沙地带空投了包含食品在内的4吨救援物资;^① 德国外交部则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德国红十字会等机构合作,派遣专员协调加沙地区德方相关行动。^② 这些举措向国际社会展示,德国“文明力量”的国家定位并未因使用权力政治或参与多边军事行动而受到影响。可以说,巴以问题是德国统筹“建构力量”“文明力量”两大身份的一个试验场。

(四) 德国意欲通过推动欧盟统一立场的形成提升欧盟声量

德国欲在巴以问题上提升本国及欧盟的话语权,彰显欧盟统一协调巴以问题政策取向的影响力。作为欧盟对外政策制定的重要推动者,德国致力于推动欧盟在巴以问题上形成统一口径,力促欧盟积极参与到冲突解决进程中。由于美国对以色列明显的袒护态度,阿拉伯国家要求欧盟在解决巴以冲突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的呼声很高。欧盟为了显示自己是当今世界格局中的重要一极,在中东和平进程中发挥作用的意识也很强烈,欧盟及其成员国官员多次表示要为中东和平作出贡献,并加强了相互协调。^③ 而且,欧盟对美国独揽中东和谈的行为早就有所不满,欧盟对巴勒斯坦的援助远远超过美国,它不甘心在中东事务上没有发言权。考虑到欧盟国家与阿拉伯国家的特殊关系和欧盟较为中立的立场,以色列也希望欧盟在推动中东和谈中发挥更大作用。1998年,欧盟在加的夫举行的首脑会议上首次就巴勒斯坦独立建国问题进行磋商,^④ 此后欧盟成为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四方机制”的成员之一,并提出了“中东和平路线图”。2014年7月,欧盟理事会通过了关于中东和平进程的决议,对巴、以两国边界问题、未来主权和安全安排问题、难民问题,以及耶路撒冷未来地位等诸多敏感问题,都提出了自身政策主张。^⑤

德国的中东政策已嵌入欧盟的中东政策立场中,而欧盟的中东政策取向

① “Bundeswehr wirft erstmals Lebensmittel über Gazastreifen ab”, *Deutsche Welle*, 16 März 2024, <https://www.dw.com/de/bundeswehr-wirft-erstmal-lebensmittel-%C3%BCber-gazastreifen-ab/a-68591728?mobileApp=true>, 2024-03-16.

② “Humanitäre Katastrophe in Gaza – Deutschland hilft auch aus der Luft”, *Auswärtiges Amt*, 28 März 2024, <https://www.auswaertiges-amt.de/de/aussenpolitik/naehermittlererosten/-/2627842>, 2024-03-28.

③ 黄泳、吕鸿:《施罗德行色匆匆访中东》,载《新华每日电讯》2000年11月3日。

④ 殷桐生主编:《德国外交通论》,第285页。

⑤ “Council Conclusions on the Middle East Peace Process”,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Brussels, July 22, 2014, <https://www.auswaertiges-amt.de/blob/2046086/e4e5c968705d3ab628309da85f6a6a2e/rsf-juli-2014-data.pdf>, 2024-02-15.

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德国的相关政策形变而成的。德国将自身的中东政策主张“上传”至欧盟政策库并形成欧盟制度，具体体现为两点：一是德国秉承的促进阿以和解以及在两者之间相对平衡的政策取向最终影响到其他欧盟国家，并上升为欧盟政策。作为老牌列强，英、法两国的中东政策体现出浓厚的殖民主义和狭隘利益观特点，玩弄平衡手段特点突出。而相对而言，德国在中东地区的根基尚浅，其不受殖民主义遗产影响，为该国发挥独特作用赢得了更大空间，有利于德国树立正面形象，进一步拓展政治影响力；二是德国坚决反对在中东非法使用武力，遵循以自由贸易的形式与中东开展在石油及其他领域的交往与合作。欧盟原则上反对美式单边主义，不希望美国的军事力量和霸权战略影响到自身的建设及中东政策。^①在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行动中，与美、英先发制人打击胡塞武装在也门境内的目标不同，欧盟“阿斯匹德行动”属于防卫性质，只执行保卫商船、维护航道安全等任务。^②德国民事型特征明显的巴以政策为本国及欧盟在降温冲突、推动和平进程上扩大了外交政策空间，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本国及欧盟的话语权。

细观德国在巴以问题上的立场演变轨迹可以发现，在不同历史时期，上述四方面因素对德国立场起主要塑造作用的程度不一。冷战期间，以色列处于对抗受苏联支持的阿拉伯国家的前沿位置，迫切需要援助，而基于对犹太民族的历史愧疚和重新融入西方民主阵营的现实需要，联邦德国与以色列一拍即合，基于安全保障的德以特殊关系自此逐渐成型；两德统一后，承接了民主德国与阿拉伯世界关系的德国不仅要致力于全球性外交事项，还要重视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特别是阿拉伯剧变与乌克兰危机发生后，德国维护本国经济和社会安全的必要性骤然提升；与此同时，德国国家定位正在经历从“文明力量”向“建构力量”转型的过程，妥善处理巴以问题恰好可以彰显德国国家转型的成功，因此，在巴以问题上，德国奉行平衡特点明显的政策主张；作为欧盟中有影响力的大国，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深入发展，德国也有义务推动欧盟在巴以问题上形成统一立场，以加强欧盟在处理该问题上

① 钮松：《德国中东政策与欧盟中东政策的相互影响》，第 15 页。

② “Security and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the Red Sea: Council launches EUNAVFOR ASPIDES”, Council of the EU, Brussels, February 2024,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24/02/19/security-and-freedom-of-navigation-in-the-red-sea-council-launches-new-eu-defensive-operation>, 2024-03-27.

的话语权，进而提升国际地位，为参与解决更多地区与全球性事务奠定基础。

三 德国应对巴以问题的成效及局限性

德国努力调整和完善其在巴以问题上的主张，但整体效果欠佳。德国没有推动巴以冲突降温上做出突破性贡献，在巴以问题上的存在感不如美、英、法等国突出，甚至也没有形成对以色列、巴勒斯坦及阿拉伯世界的实质性影响力。显然，德国在巴以问题上的政策取向在设计上和实践中面临多方面的挑战，其中既有历史的阴影，也有内部政治的影响，还有来自外部行为体的压力。

（一）德以特殊关系束缚了德国在巴以问题上的灵活性

二战结束后，联邦德国经过自我反省、向受害国道歉的历程，逐步恢复成为正常国家，拥有了正常外交关系。但在纳粹屠犹这一问题上，德国始终难以摆脱“原罪”，德以关系也就难以从特殊回归正常。德国外交“正常化”概念的重要构造者埃贡·巴尔曾指出，德国外交政策必须脱离以往纳粹的污点，进而实现“正常化”；纳粹大屠杀不应该“阻碍通向正常化的道路……过去历史的污点不应该影响未来”^①，但在德国与犹太民族关系中，加害者与受害者的角色特征最具典型性，德以关系首先表现为一种道德责任与现实政治的结合。^②在多数情况下，德以关系中的道德责任盖过了现实政治。以色列政府首脑和官员在公开场合多次提出，德以关系实现正常化不可能，原谅德国在大屠杀中的罪责也是不可能的。加之德国深深背负着道德责任，这就决定了德以双边关系的优先级排在德国与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诸多国家关系之前，任何一种对以色列的指责在德国都会招来反犹太主义的声音。换言之，德以特殊关系在德国的外交甚至内政中具有近乎一票否决的地位。

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德国在各方面无条件支持以色列。除加快对武器出口、弹压国内亲巴勒斯坦抗议等措施外，德国还压制来自社会各界的亲巴反以言论。2023年10月13日，受德国政府部分资助的法兰克福书展颁奖

^① [英国] 汉斯·昆德纳尼：《统一以来德国外交政策“正常化”的概念》，罗湘衡译，载《太平洋学报》2014年第7期，第24页。

^② Benjamin Neuberger, “Israel und Deutschland: Emotionen, Realpolitik und Moral”,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Vol 15, 2005, pp. 14–22.

仪式主办方世界文学促进机构（Litprom）取消了巴勒斯坦作家阿达尼亚·希布利（Adania Shibli）的颁奖仪式，理由是她所撰写的书以 1949 年以色列军队的暴行为基础。^① 2024 年 2 月，黎巴嫩裔人类学家加桑·哈吉（Ghassan Hage）因公开发表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暴力行为的言论被马克斯·普朗克学会解雇，学会声称其言行与学会的核心价值观不相容。^② 在本轮冲突爆发一周年之际，德国总理朔尔茨继续表达其对以色列和德国国内犹太人的支持，外长贝尔伯克也重申“德国会继续站在以色列一边……针对哈马斯、伊朗的导弹恐吓和真主党的行为，以色列有权自卫。”^③ 可见，即使在冲突爆发逾一年、巴以双方均付出惨重代价后，德国极度亲以的态度并未削减。

德国的亲以立场限制了该国提出与时俱进主张的能力。在德国国内，移民尤其是中东裔和穆斯林移民的不断流入，使得德国人口族群结构与宗教信仰者比例发生明显变化，继续偏袒以色列已经开始加剧民意分化与社会撕裂。一项由德国权威民调机构福沙舆论调查所（Forsa Institut）发布的调查显示，绿党支持者中赞成向以色列提供武器的人占 39%，而社民党和自民党的选民中则有过半数反对这一举措（社民党占 60%、自民党占 52%），^④ 这说明由是否向以色列提供武器引发的社会撕裂已蔓延至政治领域。在巴以问题上，德国以维持德以关系为借口放任以军行动，有可能加剧加沙等地的人道主义危机，这与德国自诩的“建构力量”国家理念相抵触；在全球层面，越来越多的国家表达对巴勒斯坦建国的支持，批评以色列侵蚀巴勒斯坦权益的行为，德国的亲以立场显得越来越孤单。然而，德以关系中的历史包袱过于沉重，严重阻碍德国根据国内人口结构、国际舆情趋势、巴以冲突具体情况来调整其政策取向。

① Tessa Solomon, “Artists and Writers Condemn Cancellation of Award Ceremony for Palestinian Author Adania Shibli at Frankfurt Book Fair”, October 18, 2023, <https://www.artnews.com/art-news/news/frankfurt-book-fair-palestinian-author-adania-shibli-solidarity-letter-1234683326>, 2024-10-18.

② “Statement of the Max Planck Society about Prof. Ghassan Hage”, *Max-Planck-Gesellschaft*, February 7, 2024, <https://www.mpg.de/21510445/statement-ghassan-hage>, 2024-03-07.

③ “Scholz zum 7. Oktober: Solidarität mit Jüdinnen und Juden”, *Deutsche Welle*, 6 Oktober 2024, <https://www.dw.com/de/scholz-zum-7-oktober-solidarit%C3%A4t-mit-j%C3%BCdinnen-und-juden/a-70415909>, 2024-10-06.

④ “Grüne am ehesten für Waffenexporte nach Israel – Die Mehrheit der Deutschen lehnt Waffenlieferungen an den jüdischen Staat jedoch ab”, *Jüdische Allgemeine*, 22 Oktober 2024, <https://www.juedische-allgemeine.de/politik/gruene-am-ehesten-fuer-waffenexporte-nach-israel>, 2024-10-22.

（二）德阿关系失衡损害了德国对巴以问题主张的公正性

为了能在巴以冲突问题上发挥更有效的作用，同时也为了建构与巴勒斯坦等阿拉伯国家的真正友好关系，德国需要在巴以问题上保持尽可能平衡和公正的立场，也的确为此做出了努力。尤其是在冷战结束后，德国视《奥斯陆协议》中的“两国方案”为重新行动的机会，发挥劝和促谈作用，成为推动以色列与巴解组织谈判的重要一方。德国巴以政策的平衡性在这一时期才开始慢慢显现。但总体而言，由于德以之间历史上形成的特殊关系，德国难以在巴勒斯坦（或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保持平衡。

将德以关系与德巴关系（或德阿关系）进行简单量化比较，并不能准确地说明问题。巴勒斯坦在现实中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德以关系显然会全面超越德巴关系。虽然阿拉伯世界由多个不同的国家组成，数量上的德阿关系尤其是贸易规模等指标必然超过德以关系，但如果从内质角度出发，就能看出德国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之间的明显偏好。比如，德国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都提供一定形式的无偿援助。对于以色列，德国从 20 世纪 50 年代就开始向以色列等方支付因二战中伤害犹太人的补偿赔款，后来演变为对大屠杀幸存者及其家属的赔偿金，截至 2023 年这些赔偿款项总计高达 900 亿欧元。2023 年，德国政府向全球大屠杀幸存者支付的赔偿金高达 12 亿欧元，2024 年又进一步增至 14 亿欧元。^① 由于大屠杀幸存者多数生活在以色列，上述赔偿金多数汇入以色列，且其中相当部分以现金形式发放到个人手中。对于巴勒斯坦，德国政府长期向巴勒斯坦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2023 年，德国向巴勒斯坦（包括加沙与约旦河西岸）提供的援助总计 2.03 亿欧元，2024 年这一数字估计还会有相当幅度的增长。^② 德国对大屠杀幸存者的赔偿金与对巴勒斯坦的人道援助性质不同，虽同属无偿援助范畴，但前者的规模明显超过后者。再如，德国对以色列及阿拉伯国家都有军售合作。然而，相比于阿拉伯国家买主，德国对以色列军售的条件更为优厚。在默克尔政府时期，德国向以色列出售数艘海豚级潜艇，几乎每艘潜艇售价都给予了相当

① “Grüne am ehesten für Waffenexporte nach Israel – Die Mehrheit der Deutschen lehnt Waffenlieferungen an den jüdischen Staat jedoch ab”.

② Federal Foreign Office, “Germany and the Palestinian Territories: Bilateral Relations”, <https://www.auswaertiges-amt.de/en/aussenpolitik/laenderinformationen/palaestinensischegebiete-node/palestinianterritories/228226>, 2024 – 01 – 04.

力度的折扣，从而降低了以方的采购价格。^① 同期，德国虽也曾向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出售军火，但德国从未给予阿拉伯买家任何折扣，反而设置了一些附加条件。此外，以色列担心德国对沙特等阿拉伯国家的军售会影响到以色列的安全，要求德国确保以色列军事装备在中东拥有“质量优势”，德国对以方关切也予以照顾。^②

本轮巴以冲突以来，德国在对以色列和对巴勒斯坦（或阿拉伯国家）关系上的失衡再度凸显，德以关系因冲突而更加紧密。以色列人视 2023 年 10 月 7 日哈马斯突袭为以色列版的“九一一”事件，其受害者形象与二战中的创伤经历叠加共振，进一步强化了德国对以色列的同情和支持。在南非向国际法院就加沙战事涉嫌“种族灭绝”对以色列提起诉讼时，德国还试图代表以色列介入审理，反对这一指控，认为其缺乏根据。相反，德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严重受损。由于力挺以色列被视作绝对的政治正确，德国的片面挺以态度招致越来越多阿拉伯国家民众的反感，他们认为德国事实上无法扮演不偏不倚的调解者角色。2023 年 10 月，德国驻突尼斯大使彼得·普鲁格尔（Peter Prügel）因在当地中学落成仪式上公开称以色列是“巴勒斯坦恐怖行径”受害者的言论遭到谴责，抗议者认为其言论在污名化巴勒斯坦人的反抗权，要求撤换其职务。^③ 2024 年 1 月，半岛电视台评论指出，“德国政治精英们通过对大屠杀的道德悔罪态度和支持以色列来向其提供补偿，实质上是在正当化其对以色列的支持，并借支持以色列之名来为其反阿拉伯的极端主义思想和更加激进的反移民政策辩护”。^④ 同年 3 月，埃及艺术家穆罕默德·阿布拉（Mohamed Abla）退还了歌德学院为其颁发的奖章，以抗议德国对以色

① Tobias Borck, “Germany and Israel: A ‘Special Relationship’”, 20 November 2014, <https://rusi.org/explore-our-research/publications/commentary/germany-and-israel-special-relationship>, 2014-11-20.

② Barak Ravid, “Israel Seeks German Coordination on Arms Sales to Arab States”, <https://www.haaretz.com/2012-09-09/ty-article/israel-wants-say-on-german-arms-deals/0000017f-e70a-d5f-a17f-ffde63180000>, 2012-09-09.

③ Mirco Keilberth, “Deutsche Botschaft unbeliebt”, 31 Oktober 2023, <https://taz.de/Nahost-Konflikt-in-Tunesien/>! 5970088, 2024-10-31.

④ Christoph Hasselbach/Kersten Knipp, “Deutschlands Nahostpolitik: der ehrliche Makler am Limit?”, Deutsche Welle, 11 Januar 2024, <https://www.dw.com/de/deutschlands-nahostpolitik-der-ehrlche-makler-am-limit/a-67951222?mobileApp=true>, 2024-02-11.

列的支持。^① 德国力挺以色列的态度和行为显然损害了其中东尤其是巴以问题上的软实力和名誉。

（三）盟友强势介入对德国巴以问题主张的影响力形成挤压

在全球范围内，美国是对巴以问题影响最大的国家。美国与以色列拥有极其紧密的同盟关系，对以色列拥有极强的影响力。尽管美国历届政府在巴以政策和对以色列态度上呈现出一定的波动和不稳定性，但一个清楚的事实是，美国对以色列的安全承诺客观存在，即使美国开始从中东收缩势力，这一点在相当长时间内仍无法改变。^② 德国在巴以问题上的立场、利益与美国基本相符，故十分看重美国的作用，但美国在巴以问题上的巨大作用和强势地位挤压了德国发挥作用的空间。

第一，在对以色列的支持上，德国与美国尚有巨大差距。从军事安全领域看，德国虽然是以色列第二大军火供应国，近年来在以色列武器进口中的比例约为 30%，但与美国对以色列全方面的军事援助相比太过薄弱。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安全支持包括法定的长期军援、战时和紧急情况下的临时援助，还包括多年来为以色列提供的军事培训、美国军工企业与以色列军工企业的大量技术分享、美国情报机构与以色列情报机构的深度合作，等等。美国在中东拥有数万规模的驻军，在中东多国拥有军事基地。美国在中东驻军的很多，其中之一就是保护以色列的安全。德国在中东无军事基地，也没有独立的常规驻军，缺乏在关键时刻保护以色列的资源和能力。在冷战时期的阿以战争中，美国会在危机时刻向阿拉伯国家及其背后的苏联施压，为以色列争取缓冲时间。在本轮巴以冲突中，美国承担了不少协防以色列的军事任务。例如，美国与英国自 2024 年初开始打击也门的胡塞武装，压制了胡塞武装对以色列的威胁。更明显的案例是，2024 年 4 月 13 日，伊朗向以色列本土发射了大量无人机和导弹，美国协调约旦等阿拉伯国家以及英国、法国等盟友，共同拦截飞向以色列的武器，大大减弱了伊朗打击以色列的效果。在这些实战中，基本未见德国的参与。

第二，约束以色列的问题与支持以色列的问题同样重要。由于以色列是巴以问题中的强势一方，外部力量如果不能对以色列加以制约，则很难实质

^① Goethe Institut, Mohamed Abia, 2024, <https://www.goethe.de/de/kul/pre/gme/prt/moh.html>, 2024-01-11.

^② 牛新春：《美国中东政策：矛盾与困境》，载《外交评论》2011 年第 2 期，第 15~25 页。

性地影响巴以问题进程。虽然美国奉行“楔子”战略，本质上亲以，无意真正约束以色列，但在必要情况下仍能够展示约束力，而德国则缺乏这种约束力。以本轮巴以冲突为例，美国在人道援助、定居点建设等方面对以色列进行过敲打甚至惩罚。在人道援助领域，美国曾多次表达对以色列在人道援助方面不力的关切，特别是 2024 年 10 月中旬，时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防长奥斯汀联名向以色列政府致信函，明确宣称以色列阻碍了对加沙的人道援助，要求以色列限期恢复对加沙人道援助的准入，并暗示以色列不这么做可能产生影响美国对以军援等后果。这是美国在人道援助问题上施压以色列力度最大的一次，并迫使以色列迅速采取一些改进措施。德国也不断呼吁确保对巴勒斯坦人的人道援助，但并没有采取迫使以色列改变行为的具体举措。在犹太人定居点问题上，美国认为以色列极端人士在约旦河西岸扩张定居点妨碍了“两国方案”的前景，自 2023 年 12 月开始对上述极端主义定居者采取多轮制裁措施，拜登还在 2024 年 2 月签署专门制裁上述非法定居行为的总统行政令。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同英国、加拿大等国采取了类似制裁措施。但截至 2024 年 10 月，德国仍未单独采取针对以色列定居者的制裁措施。

第三，在对巴勒斯坦的影响力方面，美国也大幅领先于德国。美国是给予巴勒斯坦援助最多的单个国家。就对近东救济工程处的捐款来看，2022 年美国为 3.44 亿美元，德国为 2.02 亿美元；^① 2023 年美国为 4.22 亿美元，德国则为 2.13 亿美元。^② 德国虽然高居捐款榜的第二位，但捐款额度距离美国尚有一定差距。更重要的是，对于与巴勒斯坦问题相关的阿拉伯国家，美国通过军售、驻军、石油美元、投资等系列手段获取了影响力，进而可以通过阿拉伯国家来影响巴勒斯坦。而德国缺乏对阿拉伯国家的综合影响力，较之美国少了对巴以问题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渠道。

（四）欧盟内部分歧削弱了德国在巴以问题上的领导力

在欧盟内部，一个统一的针对巴以问题的立场难以形成，德国在巴以问题上的领导力因此遭到削弱。自欧盟制定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以来，在中东政策尤其是在南部以地中海为重点的议程上，将欧洲描绘成一个统一行为体

① 2022 Pledges to UNRWA's Programmes (Cash and In-kind) - Overall Donor Ranking, https://www.unrwa.org/sites/default/files/overall_donor_ranking_2022.pdf, 2024-11-15.

② 2023 Confirmed Pledges to UNRWA's Programmes (Cash and In-kind) - Overall Donor Ranking, https://www.unrwa.org/sites/default/files/overall_donor_ranking.pdf, 2024-11-15.

的意愿就一直存在，但基于各国不同的历史利益和政策的遗产，如何平衡各个国家的利益与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的要求是核心问题。^①事实上，在中东热点问题上形成统一政策对欧盟来说并不容易。对2003年伊拉克战争，欧盟内部就存在迥异立场：英国支持小布什政府动武，德国、法国则强烈反对。

在巴以问题上，欧盟成员国存在传统的政策取向分野。北欧国家和一些具有左派政治传统的国家同情巴勒斯坦，而德国、英国和荷兰等国则明显亲以色列。欧盟没有在巴以问题上形成统一且鲜明的立场，只能就一些原则问题进行泛泛表态。而德国对以色列承担的安全责任以及两国特殊关系使其处于相对亲以的光谱内，无法调和各成员国的倾向而促成统一的欧盟立场。实际上，德国在一些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场合是失声的。2014年12月，欧洲议会以绝对多数通过议案，支持以“两国方案”解决巴以冲突，并呼吁成员国承认巴勒斯坦的国家地位。然而，德国因担心激怒以色列而未及时表态。^②逃避表态本身就是缺乏领导力的一种表现。

在本轮巴以冲突中，欧盟内部分歧更明显。冲突爆发之初，欧洲国家第一时间站队以色列并谴责哈马斯。随着以色列针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持续升级并造成大规模平民伤亡，欧盟开始为以色列的自卫行为添加条件，即“必须符合国际法和人道主义”^③，这被认为是对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之前毫无保留支持以色列的纠正。在以色列的战争目标问题上，欧盟重要成员国法国数次表示不赞同。2023年12月，法国总统马克龙对以色列“彻底摧毁哈马斯”的战争目标提出质疑，认为此目标“不可能实现，就算实现也会使战争持续数年”。^④然而，德国总理朔尔茨支持以色列的战略目标。他认为，“停火协议意味着以色列让哈马斯有了喘息之机，哈马斯会再次发射火箭弹，这是人们所不能接受的。”^⑤德、法的观点差异再次凸显欧盟内部立场的不统一。

① Louise Fawcett, “MENA and the EU: Contrasting Approaches to Region, Power and Order in a Shared Neighbourhood”, *Contemporary Politics*, Vol. 24, 2017, p. 73.

② 殷桐生主编：《德国外交通论》，第287页。

③ European Council Conclusions on Middle East, Brussels, European Council, 26 October 2023,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23/10/26/european-council-conclusions-on-middle-east-26-october-2023>, 2024-10-26.

④ Bernd Riegert, “Frankreichs Macron fährt eigenen Kurs im Gaza-Krieg”, *Deutsche Welle*, 4 Dezember 2023, <https://www.dw.com/de/frankreichs-macron-f%C3%A4hrt-eigenen-kurs-im-gaza-krieg/a-67628939?mobileApp=true>, 2024-01-04.

⑤ Bernd Riegert, “Frankreichs Macron fährt eigenen Kurs im Gaza-Krieg”.

巴以冲突再次引发有关承认巴勒斯坦国的讨论。自 2024 年 5 月以来，挪威、爱尔兰、西班牙和斯洛文尼亚已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马耳他等国也有类似考虑。这使得欧盟 27 个成员国中有 10 个国家承认巴勒斯坦国。对挪威、爱尔兰、西班牙等国的承认巴勒斯坦之举，德国总理朔尔茨却认为承认的时机并不成熟，现在需要的是谈判解决分歧，象征性的承认用处不大。

总体看，欧盟在此轮巴以冲突中进一步分化为 3 个阵营：亲以阵营，包括匈牙利、奥地利、捷克等国，它们强烈支持以色列，基本不批评以色列在加沙的战争行为；同情巴勒斯坦的阵营，包括爱尔兰、西班牙以及比利时等国，它们更强调人权和国际法，对以色列多有批评，支持巴勒斯坦人的自决权；中间阵营则以法国为代表，既重视以色列的安全关切，也关注巴勒斯坦的合法权益。德国的立场介于中间阵营与亲以阵营之间，更偏向亲以阵营。在欧盟内部就加沙战事、巴以问题出现争议时，德国无意也无力扮演居间撮合、统一立场的角色，而是基本站在亲以立场上，进一步暴露了欧盟内部的裂痕。这最终对德国在巴以问题上的领导力形成了反噬。

四 结语

作为世界格局中的重要力量，德国积极推动本国和欧盟制定应对巴以冲突的政策，以提升本国和欧盟在冲突解决上的话语权，最终目标是使德国在全球外交舞台上成为能够正常发挥影响力的重要一极。在实践过程中，德国在巴以问题上的主张对德国对外关系和地区局势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第一，德以双边关系事实上更加紧密。从首任总理阿登纳以来，德国就意在通过深度反思对以色列的历史罪责重新融入西方民主共同体，这一目的不仅倒逼惧怕历史原罪的德国在巴以两方中偏重以色列安全，并对其持续加强援助，而且经历数十年的演进，德以关系已经进入深度捆绑期。2024 年 5 月，德国同美国等国共同反对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卡里姆·汗关于同时申请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 3 名哈马斯领导人逮捕令的声明，认为这会造成以色列、哈马斯对等的错误印象。显然，这一表态与德国国际秩序捍卫者的自我定位发生冲突。

第二，德国在中东地区的声誉及其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遭到严重损害。虽然德国无殖民遗产包袱、对伊拉克战争的反对以及对中东难民的接纳等因素，使德国在中东的形象长期以正面为主，但在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德

国近乎无条件地力挺以色列的态度使得阿拉伯人对德国“调解者”身份产生怀疑。更重要的是，德国将在国内发生的亲巴勒斯坦活动简单归结为“反犹太主义”，这为难民危机后一度活跃的反伊斯兰的排外主义势力卷土重来提供了契机，^①德国面临着极右翼势力崛起的威胁。

第三，德国在巴以问题上的主张虽对稳定中东局势作出了一定贡献，但政策波动性对其进一步发挥作用形成限制。这一影响是德以关系和德阿关系两者的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虽然德国民事行动和多边框架下的军事行动对稳定地区局势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其主张依然无法摆脱以价值观为重要参考标准的特征。多年的实践表明，德国在应对巴以问题及相关的中东事务中，仍然深受德以特殊关系尤其是德国对以色列的道德负罪的制约，出现了付出多、投入多，但作用相对较小的困境。

德国三党联合政府于2024年11月初解体，大选已于2025年2月23日结束。新政府虽还未成立，但基于德国主流党派的力挺以色列共识，继续亲以立场、有限度援助巴勒斯坦、关切阿拉伯世界情感需求，这仍是德国新政府在巴以问题上的重要主张。从美国角度来看，特朗普就任总统，鉴于其第一任期内的力挺以色列行为和希望迅速结束冲突的表态，德国在巴以问题上发挥作用的空间可能还会受到挤压。需要明确的一点是，破解中东乱局的主要决定者并不是德国以及其他欧盟国家，我们不能夸大或过高期待德国在解决中东乱局中的作用。^②实现巴以冲突政治解决还需要各方共同参与和长期艰苦努力，需要对安全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片面袒护一方而忽视另一方的正当诉求，都会导致地区失衡，引起冲突扩大升级。德国乃至欧盟仍需要参照地区性国家利益对自身政策进行修正，更好地处理历史包袱与现实需要的关系，为冲突解决作出自身独特贡献。

（责任编辑：樊小红 责任校对：詹世明）

^① “‘The Reason of State’ – How Germany Facilitates Genocide with Hebh Jamal”, *The Thinking Muslim*, Jan. 3, 2025, <https://www.islamicity.org/103794/the-reason-of-state-how-germany-facilitates-genocide-with-hebh-jamal>, 2025-01-03.

^② 李超著：《领导与塑造——默克尔时代的德国外交研究》，第124页。

battlefield. For a long time, both Palestine and Israel have intended to use the media channel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influence the narrative discourse dire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n the Palestinian – Israeli issue. Faced with the sudden “Al – Aqsa Flood” operation, Israel launched wartime propaganda by actively setting the public opinion agenda, customizing emotional expression of discourse with double standards, controlling the flow of battlefield information, and making good use of high – tech technology and transnational propaganda networks, intending to set aside the historical origins of the Palestinian – Israeli conflict and blame Hamas for provoking the war. Although Israel’s wartime propaganda won widespread sympathy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conflict, it gradually lost ground over time and became unprecedentedly isolated internationally. The reason for this shift in public opinion is not so much that Israel’s wartime propaganda deviated from battlefield facts and declined in effectiveness, Hamas adopted post – strike political mobilization and propaganda, and new media disintegrated the information wall built by Israel, but rather that Israel, based on its absolute security concept, caused the Palestinian – Israeli security dilemma to become long – term and fall into a dilemma of periodic outbreaks. This round of propaganda on the Palestinian – Israeli conflict has caused people to reflect that the fundamental way to resolve the Palestinian – Israeli issue is to implement the “Two – state solution” and establish an independent Palestinian state; if countries want to seek a lasting peace, they need to abandon the old concept of confrontational, isolated, and absolute security and build a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of mutual trust, equality, inclusiveness, and cooperation.

Key words: Palestinian – Israeli conflict; “Al – Aqsa Flood” Operation; Hamas; Israel; wartime propaganda

Germany’s Palestinian – Israeli Policy Orientation and Its Evolutionary Logic

Li Wenhong & Liu Zehao

Abstract: The Palestinian – Israeli issue is extremely complex and involves a multitude of factors, making it an important focus of Germany’s Middle East policy. Germany’s policy orientation towards the Palestinian – Israeli issue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during the Cold War,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took a clear pro – Israeli stance; after reunification, Germany took the interests of both the Palestinians and the Israelis into account; and in the context of the accelerated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landscape, Germany has reverted to the bloc ’ s political stance. In the new round of Palestinian – Israeli conflict since October 7, 2023, Germany first unconditionally supported Israel, and then tried to balance its principled position of being pro – Israel and supporting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Palestinians, and its position has shown a fluctuating process of finding a balance.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change of Germany ’ s position on the Palestinian – Israeli issue are complex: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with Israel formed in history, the importance it attaches to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Arab world out of its own economic and security interests, the successful transformation of its own national positioning and its hope to push the European Union to realize “one voice” on the Palestinian – Israeli issue, and the need for a “one – voice” approach. Germany ’ s intention is to enhance the voice of itself and the EU by strengthening its involvement in the Israeli – Palestinian issue. Although Germany intends to further enhance its influence in regional and global hot spot affairs by promoting the successful resolution of the Palestinian – Israeli issue, its “special relationship” with Israel, the obvious imbalance in German – Arab relations, the strong involve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extraterritorial powers, as well as the weakening of Germany ’ s leadership within the EU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its position on the Palestinian – Israeli issue. These factors constrain Germany ’ s claims and practices on the Palestinian – Israeli issue. As a result, Germany ’ s resource inputs to the Palestinian – Israeli issue have been disproportionate to its outputs and have limited the impact of its policy ideas.

Key words: Germany ’ s diplomacy; European Union; Israel; the Palestinian – Israeli Issue; new round of the Palestinian – Israeli conflict

Analysis of the “Identity Nesting” Strategy of the Iranian Government towards Trans – border Ethnic Groups: Taking the Kurdish People as an Example

Wu Tongyu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hanges unseen in the century, the issue of identity politics among trans – border ethnic group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